

高举旗帜·
拨转航向·
探索新路

□ 郑永红 吴翔

“我相信，通过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在武汉东湖新城社区饱含深情的话语振奋人心。翻开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壮丽史册，上个世纪20年代，武汉一度成为革命的中心。英雄的武汉人民，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高举红旗、探索新路，开启了由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反帝外交大胜利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武汉三镇各界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武汉人民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引发了帝国

主义的关注与紧张。1月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英租界外江汉关码头前面的空场内讲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前来听讲的群众越来越多。英国租界当局十分恐慌，调动长江中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登岸，扑向赤手空拳的听讲群众，挥舞枪托乱砸，拔出刺刀乱捅，刺死1人，打伤30余人，酿成了惨案。

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于第二天在汉口《民国日报》公开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严正声明：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随后，向国民政府递交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政府立即收回汉口英租界。

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中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了。1月5日下午，武汉30万群众不顾寒冷恶劣的天气，顶风冒雨从四面八方赶到汉口参加“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庞大的反英示威队伍涌上中山大道，浩浩荡荡直接冲进了英租界。愤怒的人群冲上屋顶，扯下了英国米字旗，英国巡捕房的标志也被取下。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当局不得不在2月19日与中国签订《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将租界内的行政事务交由中方市政机关。3月5日，国民政府汉口第二特别区市政局成立，正式接管英租界的行政事务。至此，中国收回汉口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利用自己的力量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失去的权益，是近代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充分彰显了武汉人民的英雄气概。

农民革命大本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1926年10月中下旬，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上旬，他由广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在《目前农运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战略部署。12月，毛泽东从南昌到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磋商武昌农讲所事宜。

面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国民党右派以及地主豪绅，无不曰之“糟得很”。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大肆指责农民运动已经“越轨”，是“痞子运动”。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为澄清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错误认识，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2月21日，毛泽东回到武汉。他在居住的武昌都府堤41号满怀激情撰写了2万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农民运动，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是好的得很”。毛泽东这份报告引起广泛关注。在4月出版的单行本中，瞿秋白亲自为该书作序，热情洋溢地建议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毛泽东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称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从湖南回武汉的毛泽东深感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并积极向国民党中央农部提出建议。3月7日，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学员包括来自17个省的739人。开学宣言中指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农讲所一共开设29门课程，毛泽东亲自为学员授课，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如董必武、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在农讲所任教。毛泽东尤其注意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经常在大操场检查学员军事训练情况。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训练和战斗实践，大批学员被锻炼成农民运动工作的骨干和军事人才。许多武汉农讲所毕业的学员积极投身于各地的武装起义，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时间，群雄四起，星火燎原。

紧急会议拨航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神州大地风云突变。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武汉三镇弥漫着腥风血雨，反动军警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极其险恶环境下，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党中央紧急会议。

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出席会议的只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也参加了会议。八七会议由李维汉主持，有三项议程：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报告，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时间很短，只开了一天。

在会议讨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这些重要论断，实际上提出了加强党对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领导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等决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机系统、有计划、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军的总暴动。会议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八七会议彻底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中国革命翻开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经验： “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

□ 张俊国

省市要对本地区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疫病情况进行仔细检查和讨论，除将讨论情况和计划报告中央之外，还“应当每半年将防治工作向中央作一次专题报告”。很明显，他提出这样要求的目的是要以此种方式了解和掌握各地和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从而为正确决策提供参考。据此，不少省份都出台了疫情报告的专门文件，如华东区制定了《华东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山东省下发了《关于各地应严格执行疫情专案报告的通知》、天津市颁布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报告暂行办法》等。北京市在制定的《北京市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中对如何做好疫情报告工作更是从谁是报告人、如何报告、报告时限等方面作出了十分详细且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规定。

正是在全国各地积极探索疫情报告制度体系的基础上，195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发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其中对疫情报告时限的规

千秋凛然英雄气 ——卢德铭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杨西河

卢德铭烈士陵园位于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山口岩村，与武功山相对，同袁水河为邻，青松翠柏环绕之间，卢德铭烈士墓坐落于此。纪念碑分碑体和基座两部分，碑高七米，上塑卢德铭全身像，寓意为烈士牺牲于1927年。碑身正面镌刻着杨得志题写的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卢德铭烈士纪念碑”，背面大理石上刻着烈士的生平简历。碑文如下：

卢德铭，四川省自贡市双石铺狮子湾人，生于一九零五年六月九日。一九二四年春投笔从戎，由孙中山先生荐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英勇聪慧崭露头角，擢升为军校学生军侦察队长。北伐战争开始后，调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任营长，七十三团参谋长。战斗中，身先士卒，智勇双全，取攸县，克平江，攻武昌，浴血汀泗、贺胜二桥，所部勇冠三军，战功卓著。一九二七年初，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重托，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一九二七年年秋，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当秋收起义部队严重受挫的关键时刻，他坚决拥护毛泽东挥师罗霄、开辟红色根据地之主张。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卢德铭等率部从浏阳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途经萍乡市桐木、小视。二十五日晨，行军至芦溪山口岩，不期遇敌，鏖战猝起。卢德铭临危不惊，指挥若定，迅速夺得高地狙击敌人，当他掩护部队转移进山时，所乘白马经开阔地为敌注目，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三岁，从此，他的忠骸长卧在江西的红土地上。

卢德铭烈士为国捐躯，英年早逝，其浩然正气与江河共在，与星月同辉，萍乡人民素仰烈士英灵，每当清明以降，趋而拜谒凭吊，怀其功业，继其遗志，扬其精神。一九八七年秋，萍乡市人民政府修建烈士纪念碑，以烛后世，以励来者，此亦吾桑梓之殊荣。

卢德铭烈士永垂不朽！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碑文500余字，倾注了人们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凸现出“纪念英烈，激励后人”的建碑主题，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崇尚英雄，就要像卢德铭那样“以身许国、冲锋在前”

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卢德铭从小心怀报国之心，决心学习军事，以武力打倒列强和军阀。他于1924年毅然投身黄埔军校参加革命，在毛泽东、叶挺等共产党员的影响和教育下，当年加入了党组织。1925年2月，黄埔军校东征，卢德铭任学生军侦察队长，率60人参加

战斗，数次化装潜入叛军陈炯明军侦察情报，提供了大量情报信息。1926年革命军北伐，卢德铭随叶挺独立团进发，迭战迭胜，战功卓著。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开始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彻底失败。8月初，卢德铭毅然率部从武汉开往江西，准备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悉起义部队南下，随即率部到修水同平浏农军会合。不久去武汉向中央报告工作后，即赶回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在文家市参加毛泽东主持党的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时，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主张。

9月25日，部队在山口岩遭敌伏击的危急关头，卢德铭挺身而出，亲自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夺下白泥坳山头，英勇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敌人占领了白泥坳制高点，向撤退部队发起猛烈射击。卢德铭被流弹击中胸部，牺牲在山口岩猪百丘田岸下。战斗结束后，英雄的遗体由当地农民周仁榜掩埋在他家屋后小土坎茶树下。

当毛泽东听说卢德铭牺牲时，悲痛万分，忍不住仰天长叹：“还我卢德铭！”并感慨地说道：“给3个师也不换！”由此可见卢德铭在他心中的地位，正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今天我们崇尚英雄，就是要从英雄精神中汲取优秀品质和基因营养，危急关头舍生取义彰显忠诚，以实际行动许国挺身，冲锋在前，践行使命。

铭记英雄，就要像卢德铭那样“赤胆忠心、战斗不止”

1926年5月，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6月2日在攻占攸县的战斗中，卢德铭虽然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但他主动掌握战机，率领全连乘胜追击敌人。对这种作战的机动灵活性，叶挺称赞不已，他常说：“战功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的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们。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4连连长卢德铭在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这是对卢德铭极高的赞誉。之后，在攻克醴陵、平江的战斗中，卢德铭带领第四连绕到敌人背后，向敌人薄弱环节袭击，对敌造成夹攻之势，使守敌大部被歼。特别是攻打天险汀泗桥和贺胜桥的关键战役中，卢德铭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立下了赫赫战功。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典礼上称赞说：“革命需要大批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的《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中提出必须通过普种牛痘的方式对其加以解决的新路径。

按照这一指示，1950年下半年，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规定凡无正当理由拒绝种痘，经说服教育无效者，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得予以强制执行。对于已种痘者，应发给种痘证；对于种痘中发生的一切费用，人民政府实行一律免费的政策，这就免除了不少普通民众因担心付费而拒种的后顾之忧。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种痘工作的快速开展，政务院在发布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对于秋季种痘与一些地方群众风俗习惯不合的问题，各级政府和卫生防疫人员一定要注意宣传教育工作，让群众打破那些非春天不种，桃花开不种，麦子出穗不种，甚至有些必须择日算卦才种的不科学的陈规陋习。这样，经过各级政府和卫生防疫人员的辛勤努力，至1952年上半年，全国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次。到1961年，新中国在全世界率先宣布消灭了流行几千年的天花病。此外，通过死菌疫苗注射、生菌疫苗注射和卡介苗苗接种等举措，在我国肆虐多年的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疫病终于得到了控制，有的甚至绝迹。